

中國哲學原論：原性篇 唐君毅著（香港九龍新亞書院研究所，民國五十七年出版。定價港幣廿四元。）

唐君毅先生著中國哲學原論：原性篇於一九六八年二月由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研究所刊行。本書是中國哲學原論上篇（一九六六年出版）之續篇。二書皆為有關中國哲學問題之巨著。對於上篇我曾寫了一篇介述，發表於本港明報月刊第一卷第九期。現在再擬介紹其續篇。

唐先生在寫此書之前，已先後發表了下列諸書：①中西哲學之比較論文集（一九四三）；②人生之體驗（一九四四）；③道德自我之建立（一九四四）；④心物與人生（一九五四）；⑤文化意識與道德理性（一九五八）；⑥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一九五三）；⑦人文精神之重建（一九五五）；⑧中國人文精神之發展（一九五八）；⑨哲學概論（一九六一）；⑩中國哲學原論上篇（一九六六）。以上十書在唐先生之寫作過程中可略分為三階段：①至⑤為第一階段，⑥至⑨為第二階段，⑩為第三階段。就時間上說，第一階段之書多是唐先生在來香港之前所作（心物與人生與文化意識與道德理性二書是來港後出版，但大部份寫成於來港之前）。唐先生在寫此一階段之書時，是以平靜之心，專注於論述人類純哲學思想之問題，或對中西哲學思想之異同作比較之論述。其第二階段之書，則為來港後最初十年間所寫成。其在寫此一階段之書時，則是經歷了中國文化思想之劇烈變動之後，對中國傳統之哲學思想作深一層之反省，並對西方文化作進一步之考察後所寫成的有關中西文化與哲學思想之論述。此諸書之主要論題為對過去中西學術文化作反省之討論，及對人類未來之前途作理想之展示。其第三階段有關中國哲學原論之書，則為近十年來所寫成。此為唐先生於通論中西文化，綜述中西哲學思想之後，再返而專對中國哲學問題作訓詁上之考訂、歷史上之疏論、與義理上之辨析、確定與展示之書。此為對中國哲學思想之繼承與開展之著述。本文所要介紹之中國哲學原論：原性篇即為屬於後一階段之著作。

以上是對唐先生之著述作一般性之介紹。此下將專就其中國哲學原論：原性篇作簡要之介述。此將分別作三節介紹：一為就有關本書之寫作方法之介紹；一為有關本書之主要內容之論述；一為有關本書之時代意義之簡說。

就寫作方法上說，本書所採用之方法值得特別介紹者，即為其所標示之以「仁義禮智」之心以論述先賢之說。本書「自序」對此一方法有如下之陳述：

吾今之所謂即哲學史以爲哲學之態度，要在兼本吾人之仁義禮智之心，以論述昔賢之學。古人往矣，以吾人之心思，遙通古人之心思，而會得其義理，更爲之說，以示後人，仁也。必考其遺言，求其詰訓，循其本義而評論之，不可無據而妄臆，智也。古人之言，非僅一端，而各有所當，今果能就其所當之義，爲之分疏條列，以使之各得其位，義也。義理自在天壤，唯賢者能識其大，尊賢崇聖，不敢以慢易之心，低視其言，禮也。吾人今果能兼本此仁義禮智之心，以觀古人之言，而論述之，則情志與理智具到，而悟解自別。（頁七）

唐先生特標此一本「仁義禮智」之心以論述先賢之學，主要之用意有二：一爲有感於中國古人所採用的治學方式對有關中國哲學思想之了解不得當；一爲有見於近代人所標示的種種方法論之亦不足以適切地了解中國之哲學思想。因此，乃提出其兼顧及人的仁義禮智之心相互爲用的方法，以求對先賢之學求一適切之了解，以免由於只循人心某一方面之偏用而來之誤解。

古人的不得當，據本書所舉者有二：一爲自爲宗主之態度；一爲兼宗教之崇信的歷史考證之態度。前者爲先秦諸子論學之一般態度，及後代徵引他人之言以自註自己之說的學者之論學態度。諸子中如儒、墨諸家之說，即多爲直接陳述其自己所見及之義理，其徵引詩、書或古人之遺訓，亦多爲只略取其與己說相類似之義，以證成己說，而並未能顧及其所引之言說之原意爲何，及其與自己之說所存有之異同所在；其對於他家思想之評論，亦並未能先客觀地了解，而只是就己所見及者而作評論。故此，凡其所言所論，大體上說，皆爲基於一自爲宗主的態度以立說。就近代之觀點上說，此即犯有任從主觀之偏蔽。至於後世儒者如陸象山所標示的六經註我之說，亦爲此一態度。後者則爲漢後之學者，他們陳述其自己所認爲真之義理時，常視其說與其所崇信所宗主之古先聖賢之言相同，並藉訓詁考據之術，以證明己說與古說之本義相合，或謂其說爲古說之隱義；並由此進而以爲凡後世之學者所見及之義理，皆不能溢出於其所崇信者之說所涵之義理之外。此一論學之態度，即爲一帶有宗教性之信仰而兼輔以歷史考證之方法以成其所信之態度。

至於近代之不得當，本書所特舉者則爲一般自命爲純歷史學者之態度。此一態度，以爲凡哲學思想皆爲由不同之時代，不同之社會文化而來之不同之產物。其對於聖賢之言教，或普遍而永恆之義理加以否認，以爲一切思想皆爲相應於時代而產生，根本無所謂永恆不變而可以爲萬世法之義理。

以上三態度，唐先生以爲皆有所偏蔽。一爲只能以「仁心」說，而未能以「學心」

聽。因此對古人或他人之說未能客觀地了解，而只是主觀地引用，故對「智」之事為有虧。一為只知本恭敬之心以探求古先聖賢之說，並盡歸天下之美義於其所崇信之先聖先賢，而未能見及其外或其後學者之功，而隱沒了後來學者對先賢之說由引伸發展而來之業，忽略了歷代學術思想之演進面與發展義。此即對於「義」為有虧。至於第三種態度則只見人之義理之呈現與歷史上之時節因緣之相配合，而以時節因緣為偶然的相對的，因而即以義理亦為相對的，而不能見義理本身所具有之普遍義與常新義。故其只見變而不知常。因而亦不知聖賢之說有其普遍與常新之義，其言教有可作為人之思想行為之準則之處。其既無所見於此義理之常，或故為否認此變中之常，故其即以聖賢之說與眾說，或一時之說等量齊觀，而不能對聖賢之說有崇信之念。此則不特於「智」有所不足，而對於其所具有之恭敬之心與禮敬之情亦隱沒之，而未顯其用。

以上所述三法既皆有所偏蔽，為救其偏而補其蔽，唐先生乃標示前面所引兼顧及人之「仁義禮智」之心相互為用的治學方法，期本之以對中國傳統思想求一適切的了解。

上評三法，前二者為中國古人所具有之法，後者為近世所倡導之法，三者皆為多人所信服，而後一說近代正盛行，而以之為科學方法，今說其皆有所偏蔽，人對此或不能無疑。關於此一問題，我們若平情地細為了解，而不泥守於傳統，亦不困惑於近代所倡言之某一科學方法，則我們即可見唐先生所說之確當處。首先我們應了解者為唐先生以上言三法有偏蔽，是就其相對於了解中國傳統之哲學思想上說，而並不是以此等方法為全然無用者。因在傳統之中國學術史上，前二法皆表示了其一定之功用，而在近代之學術上，後一法亦盡了其一定之功用。但若用此三法作為了解中國傳統之哲學思想之方法，則即犯有誤用方法之弊，而產生上述唐先生所說之缺陷。此可以由傳統之中國學者以前二者以治中國之學所得之結果，及近世學者以後者以治中國之思想所得之結果上得到證明（此一問題因牽涉過廣，非本文所能細及，故暫不多論）。唐先生因深了解以此三法去研究傳統中國哲學義理之不當，故諄諄以此中之偏蔽為戒，而另標示其兼顧及人之「仁義禮智」之心相互為用的方法，以為了解之道。因既以中國哲學思想之義理為了解的對象，此即不同於純宗教式之崇信，亦不同於純展示自己之思想，亦不同於對自然或歷史之材料作純現象式之處理，故不可以上述任何一方式為了解之法。因對象不同，所欲求得之結果不同，即應有不同之方法以了解之。執傳統之治學方法或近代之某一科學方法，即皆犯有上言誤用方法之弊，而不能獲得適切的了解。唐先生中國哲學原論諸作，即為本其「仁義禮智」之心相互配合之了解法，以了解傳統之中國哲學思想而

寫成，而本文所介紹之中國哲學原論：原性篇更爲其用此法所寫成之最稱心之作。

本書除自序外，正文共分爲十七章，另附編三章。全書共六百五十八頁，約四十三萬餘言。其所論述由中國人性觀之方向開始，進而按歷史之順序以論述春秋時代、先秦諸子、秦漢學者、漢魏學者、魏晉學人、隋唐佛學家、宋明儒者、以及清代儒者諸人之人性說。最後總論性之諸義及言性之諸觀點，與中國言性思想之發展。附編則論述朱子與陸象山之工夫問題。

由以上簡單之介述，我們見到唐先生此書爲通看整個中國哲學史以論述中國哲學思想中人性之涵義。本文因篇幅所限，對各章所論性之涵義，不能逐章介述，今擬總括地介述其要義於後。

人性問題爲中國哲學思想之一中心問題。大致上說，中國思想即環繞人性觀念而展示。積二千多年來對人性不斷之探討、了解，中國思想對人性之涵義乃有豐富之經驗。但此是通看整個中國思想而說。至於若就過去中國學者各別之思想來說，則他們多不能有此通觀之識，亦無全部體認、辨別其自性之工夫，而僅能就其所見及人性之一面以言人性之涵義爲何，或只能各別地崇信一個人或一家之人性說，即以之爲準，而不能對人性有全盤之了解，亦不能見各說之異同之所在，及彼此分際之處。因此中國歷史上即有對人性問題之種種爭論。各人皆就其所見所識以非議他人之說，而不能自覺及其所言者之所本，與其所非者之所本之異同之所在。甚至有彼此所見本同，只因表示之語言或方式之不同，亦不能相互了解，而竟以他說爲非者。因此其對所爭論之問題，既不能有相互之了解，亦少有針鋒相對，與扣緊其論端，而對人性加以討論之說。此即爲中國古人就上節所舉自爲宗主、或宗教式之崇信、或歷史性之考證的治學方式而來的對中國哲學思想了解不足之處。

以上所說爲傳統上對人性觀所了解之缺陷。至於今日學者對於人性觀之問題，大致地說，仍是多犯有古人所犯之偏蔽，而未能對人性有適切的了解。近人的人性觀仍多或爲據一家一派或一個人之說以言人性爲何，或就己之一孔之見，或就現代流行之某一觀念以說人性爲何者。近人仍甚少注意及人性之全部涵義，故未能對其有全盤的了解，或對其作全面的展示。唐先生本書最主要之貢獻即爲本其上述之方法以通看整個中國哲學思想上之人性觀念，而求對其作一全盤的了解，並更深自省察、體認，而窮究人性之全部義蘊；再由之而鑑察、類別中國哲學思想上各家各派與各個人之人性說之各別義理根源，及彼此之分際之所在，及其在整個中國哲學史中之得以顯示之因緣，及其繼承與發

展之道。本書第十七章「總論性之諸義及言性之諸觀點，與中國言性思想之發展」對上述之義有以下總括性之表示：

在此一切複雜多歧之言性之諸論之中，吾人仍可……知古今論性之言之所會聚之地，與所自出發之觀點之大者。此則不外或為由向外觀看思省，以知人與萬物在自然或社會所表現之共性、種類性及個性、關係性；或為向外思省而知之人與萬物所同本或同歸之形而上的最初最始之一因、或最終果之體性、或形上的實體性；或為由向內觀看思省而知之吾人之當前有欲有求之自然生命之性，與有情有識而念慮紛如之情識心之性，更求知其實際結果及原因之體性；或為向內思省而知之吾人之心靈生命所嚮往，而欲實現、欲歸止之人生理想性；而即此理想性，以言人之生命與心之最初或最終之體性與價值性。分別由此四方面出發之言性之論，則恆須通過一內外先後之交之性，……以為轉向其他之觀點之中樞。此五性，即吾人今可憑之以觀中國先哲言性之思想之流變者也。（頁五一四至五一五）

此即為對人性有全部之認識後再本之以通看整個中國哲學思想中各人性觀之涵義，辨析各說之義理之所本，及彼此分際之所在之言。對人性既有此全部之認識，即可有根據本書上述之方法論，以從事於對中國傳統上之人性觀作訓詁上之考訂、歷史上之疏論、與義理上之辨析、確定與展示之諸論述。並可分別了解各先哲言性之義理之所本。故本書對先哲之諸性說有下列之分辨：「對德言性」，「對習、即生、即心言性」，「復心、對心言性」，「即空、即識、即種姓言性」，「即生道、即理言性」，「即心性工夫以言心性本體」，「即氣質、才、習、情、欲言性」。並進而就此各不同之性說以疏論環繞此諸說而與其在義理上有關連之諸問題，及確定由此而成之諸義理層次，及不同之系統等。由此本書對傳統各家與各個人言性之義理所在，各說與各系統之異同所在，各說所承前與發展之路向，及各說之問題所在等，皆有清楚之論述。因此其對中國哲學思想上有關性說之縱橫面及其深廣度皆得以窮究，並得以顯示由對歷史上人性說所窮究而得之義理，與由人性自身所可顯示與認定之義理，二者之一致性。故本書即盡了其對中國哲學思想上人性說之研究，而同時顯示了人性自身之義理之極限，而成為既為歷史性之中國人性論史，而同時亦為哲學性的或義理性的對人性涵義之窮源與極流之書。

佛學自釋迦牟尼圓寂後，後世對佛學理論各就己見以立說，而有大小乘之別，宗空與宗有之爭，及其他教義教法等問題之不同，而各以己派之說為正，而視他說為非正道、為異端。至後來天台、華嚴二宗乃有判教之說，各依其教義而判別佛教各派以各別不同之時、教（註），而同時肯定各宗之說皆為佛說，以顯佛學之全部涵義，而去除傳統上許多不必要之爭論。西方哲學發展至近代有理性主義與經驗主義之相對峙，二者各

持己說而非議他說，入主出奴紛爭不已。至康德出乃寫純粹理性之批判以確定理性主義之說與經驗主義之說各自所具有之一定意義，並由之進而顯示人之知性之限度，與認知心各別不同之活動，並確定相應於此而成之學問之不同層次，及其一定之界限。中國哲學思想以人性觀為中心，由孔子至今二千餘年，對於人性觀有充分之顯示。但歷代學者多各就已見以為說，是非紛紜，因而對人性不能有一整全之理解。唐先生之書對此一中國傳統之人性問題作一全盤之了解與疏論，而明各家之說之理論本源與彼此分際所在。其與佛學之判教及康德之批判所用之方式與所對之問題雖然不同，但同為對一傳統上爭論不決之問題加以疏論、決定與展示。佛學經天台、華嚴之判教，理性主義與經驗主義經康德之批判後，即免除了後來許多不必要之爭論，而對各有關之問題有確定之了解。中國哲學思想中有關人性觀之問題經唐先生疏論、分辨與確定後，亦應因之而對人性有適切之了解。過去傳統上之爭論，固應因此而消弭，而近人對人性之偏見與誤解，亦應有所糾正，而現代由於對人性不健全之認識而產生之種種弊害，亦應逐步得以糾正。由此而言，唐先生此書應不只限於有疏論中國哲學思想及展示人性之義蘊之功，而當另有其時代之意義。

李 杜

註：天台宗判佛教各派為五時八教。五時：①華嚴時，②阿含時，③方等時，④般若時，⑤法華涅槃時。八教分為化儀四教與化法四教。化儀四教：①頓，②漸，③秘密，④不定。化法四教：①藏，②通，③別，④圓。華嚴宗判佛教各派為三時五教。三時：①日出光照時，②日昇轉照時，③日沒還照時。五教：①小教，②始教，③終教，④頓教，⑤圓教。二宗判教之說雖彼此不同，但其有一共同之精神，即同承認佛教各派皆為釋迦牟尼佛之說，而以各派立說之不同，為相應於釋迦佛說法之時間之不同與教法之差異之故。並由此而分辨其或為佛說之究竟義，或為其權宜之說。又法相宗亦有三時判教之說，第一時為有教，又曰初教，第二時為空教，第三時為中道教。

Money and Monetary Policy in China, 1845-1895. By Frank H. H. King.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 1965.)

這是一本研究十九世紀後半中國貨幣問題的專題著作。全書內容分為四部：導論；第一編，中國貨幣制度；第二編，中國貨幣的演變；結論。這本書對於研究十九世紀後半中國近代化問題、近代經濟瓶建問題的人提供了一個重要線索。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在對外關係上，迭遭挫敗，求「變」思想由萌芽而茁揚。誠如羅斯托(W. W. Rostow)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